

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
纪行之东部篇(上)

自2011年至今,经过三批创建,全国已有93个城市(区)进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行列。目前,第四批27个城市(区)的创建工作正在进行中。这些城市(区)承担着探索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新模式,着力形成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长效机制,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创新使命,让公共文化服务从“有没有”升级为“好不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示范责任。

近日,本报记者以“行走”的方式,探访了长江经济带上的9个示范区,并结合东、中、西部的不同地域特点,从供给侧改革、城市发展及城乡一体化等角度对示范区创建的成果进行观察,并以“三城记”的形式推出系列报道。作为“东部篇”,我们通过(上)(下)两期,讲述发生在江苏苏州、浙江嘉兴和上海嘉定的故事,呈现示范区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中的探索及产生的影响。

在供给侧改革推动下

公共文化服务改变了什么

本报记者 王学思

文化馆是干什么的?这是干了30余年文化工作的“老群文”、浙江省嘉兴市文化馆馆长马学文过去常被问及的问题。“群众有这样的疑问,说明他没来过文化馆,不了解我们有哪些服务,这就需要我们反思,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又该怎么解决。”他说。

其实,不仅是马学文,近年来反思和扭转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和局面,着力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低效、供需不匹配和供给主体单一等问题,已经成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推进供给侧改革、打破服务困局的重中之重。

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近年来,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方面展现出勇于革新的魄力和善于创新的能力。特别是以江苏苏州、浙江嘉兴、上海嘉定这些成功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代表的地区,行走其中,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改变显而易见——

一座座有颜值、有温度的公共文化空间在城市和乡村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壁垒在慢慢消解;一系列有体量、有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与产品被精准送至群众身边,人们的

文化获得感日渐增强,文化工作者的自身价值得以更好实现和提升,社会组织和企业对承担社会责任有了新的认识 and 追求。

也有一些改变不容易被大众直观地看到。比如各地着力强化公共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政策和经费上的倾斜、标准化服务体系的建立、督导和考评机制的完善……自2011年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中,长三角地区的诸多探索可谓不谋而合,这也成为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内生动力。

在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公共文化服务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改变了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上海市嘉定区文化和旅游局社会文化科科长齐秋生拿起手机给记者看了一条微信。那是她的一位朋友通过“文化嘉定云”预约到父母特别想看的戏曲演出门票,带父母看完戏后发给她的。微信里写道:“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做孝子的机会。”

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是广大群众,如果说改变,那自然是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也恰恰构成了一座城市、一个社会的气质和文化风尚。

棠果

棠果的儿子顺利考上江苏的南京艺术学院后,她一下子多出许多空白时间,亟待填补。虽然自小就生活在苏州,她却几乎从没听过昆曲,不了解苏绣,也没进过美术馆。今年初,在给市民卡充值的时候,她知道了“文化苏州云”这个平台。通过预约,她参加了文化之旅,在苏州地区的好多博物馆打卡;她还参与了不少传统文化类的体验项目,如今她家里挂满了参加活动时DIY的年画、香囊、团扇、泥人、灯彩……她说,艺术如今已经不仅仅是爱好,而是她生活里的必需品。

李萍

李萍是上海人,曾在世界500强外资公司从事高级管理工作。几年前,她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上海嘉定区文化馆,完整学习了上海师范大学李平老师的工笔画公益课程。她说,李平老师的讲述点燃了她对中国画的热情,那种感觉仿佛是灵魂被点亮了,她希望自己能点亮其他人。于是,李萍成为一名社区文化指导员,在嘉定区文化馆开设了少儿书法启蒙和成人工笔画团扇两门公益培训课程。独特的教学魅力和个人见解,让学生们特别喜欢她。

余雷

余雷家住浙江嘉兴平湖市新仓镇石路村,退休前是一位教师,退休后他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就是去村里的图书室看书。2016年,在平湖市图书馆和新仓镇综合文化站的号召和推动下,镇里的各个村开始成立农民读书会。老余自告奋勇带领村民读书,帮他们荐书。他发现好多村民都说不太清中央的政策,他便收集报纸上的重要文章在读书会上给大家宣讲。他说,现在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读书会这样的活动刚好呼应大家的文化需求。

变革中的“供给侧”

——来自长三角的报道

本报记者 王学思

一直以来,公共文化机构是为群众提供公共文化场地、活动、服务和产品等最直接的供给主体。因此,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过程中,在供给侧改革进程中,公共文化机构的从业者对于改革的理解以及他们工作内容和方式的转变,也许可以成为呈现改革成效的一个切面。

更下沉:城乡差距迅速缩小

学音乐出身的吴怡岑现在是浙江省嘉兴市文化馆表演艺术指导中心的主任,十余年工作经验的积累,已经把她历练成组织市民文化节、乡村文化艺术周等大型、重头活动的好手。然而,谈起在业务水平方面的大幅提升和收获,吴怡岑说那应该是最近几年的事。

2013年10月,嘉兴获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资格,随之开始启动文化馆总分馆体系的构建。为了更好地发挥市文化馆作为中心馆的重要作用,馆里对原有的机构设置做了很大调整,原来的音乐、美术、书法、舞蹈等业务处室,被重组为规划协调中心、人才培训中心和几个业务支持中心。

吴怡岑的工作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以前省里组织文艺活动或者比赛,我的任务就是把文件传真给各县、市、区,由他们报送个节目就行了。现在要组织节目参赛,则要从基层的1200多个村逐级比赛,选拔到镇、县(区)、市,这样一来,原本可能就组织一场演出变成了现在自下而上组织上百场文化活动,最直接的受益人就是基层群众。”她说。

当然,这上百场活动并非吴怡岑亲力亲为,因为在总分馆服务体系下,从各个区县文化馆总馆、乡镇分馆到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都有对应的业务干部在紧密配合,但吴怡岑不再是坐等报送节目,而是要在业务上为各区县提供指导和培训等支持。

在吴怡岑看来,构建文化馆总分馆体系这样一种机制,其创新就在于运用了供给侧改革的思维。而总分馆体系的价值就在于它让公共文化活动和真正下沉到了基层、农村。“文化馆总分馆的建设让群众家门口的文化设施真正发挥出效用,基层的文化团队也因此愈发活跃。现在,我们不仅有‘文化下乡’,我们还有‘演出进城’。随着优质资源的下沉,城乡之间的差距正迅速缩小。”

苏州

更高效:“提速”不只一点点

芦佳良从事图书馆的工作已经有11个年头了,现在他是江苏苏州姑苏区图书馆副馆长。从2011年苏州开始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各级公共图书馆接待读者的数量和服务质量都在显著提升。芦佳良没有料到,看似平淡的图书馆工作,在服务读者的过程中却可以存在“爆棚”。在他看来,这些变化源于图书馆开始更多地站在读者的角度为他们提供真正需要的服务。

“‘为人找书、为书找人’是图书馆员的基本工作。过去,读者在图书馆找一本书如果没找到可能只好作罢。但是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立后,服务的供给端一下子从一个单体馆扩大到整个总分馆体系,馆员可以将读者的借书需求上传给体系内的各个馆,大家一起帮读者找到这本书。”说着,芦佳良向记者展示了当天总分馆系统平台发送给姑苏区图书馆的读者预约书目列表,列表里100多本书的书目数据,都是读者通过一个叫“书香苏州”的手机APP在网上预约借阅的书。而芦佳良的任务就是在馆内找到这些书,然后打包好,等着物流来取走,再分别送至每个读者选定的就近取书点。

芦佳良说,2014年苏州图书馆推出了“网上借书社区投递”的创新服务项目,“书香苏州”APP应运而生。在没有“书香苏州”之前,平均一周他也能调配20多本书,不像现在一天有100多本,数字化手段让读者阅读需求的响应效率“提速”不只一点点。

更年轻:拓展服务的“维度”

如果说吴怡岑和芦佳良所感受到的供给侧改革涉及的是服务供给的“深度”与“速度”的话,那么在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文体活动中心工作的黄芳和黄荫红则是从拓展服务“维度”上进行了尝试。

安亭镇位于上海市西北郊,以汽车产业闻名,地域面积约占嘉定区的1/5,常住人口9万人,外来人口超过15万人。黄芳是安亭镇文体活动中心副主任,她坦言,过去光顾文体活动中心的主要群体是中老年人,此外,她每年的工作无外乎是埋头策划一下“三下乡”演出,逢寒暑假再搞一搞青少年的活动。“必须要花心思、想办法改革创新,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产品,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她说。

帮黄芳一起想办法的,还有文体活动中心的群文干部黄荫红。“如果只利用文体活动中心的资源,很难满足年轻人的需求,所以咱们得盘活更多资源。”黄荫红说,人们总觉得要享受高雅艺术和优秀文化项目就得到市区去,其实在安亭有很多优秀的文化资源可以被“开发”成公共文化服务。于是,她请来了团扇、药泥布等非遗传承人在中心开展互动体验活动,还邀请专业老师给大家上歌剧、书法的鉴赏课。同时,他们组织成立了“安亭青年艺术联盟”,生活工作在安亭及周边地区的青年人都是可以加入这个联盟,参与文体活动中心的文化活动,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以镇文体活动中心的创新能力和财力,要长期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还是比较吃力,幸好有市里、区里每年通过政府采购配送下来的60余场有品质的文化活动作为重要补充。这些活动大都是由比较成熟的社会组织或企业提供,服务质量普遍较高。如今,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越来越满意。”黄芳说。

嘉兴

嘉定